

◀（上接9版）

我儿有心费钱，如何娶个婆子。遂至诉讼。官差往拘之，见镜慌云，如何就有捉违限的。及审，置镜于案，官照见，大怒云，夫妻不和事，何必央乡宦来讲。这两话所讲的都是妻子将镜子中自己的影子误认作丈夫的小妾而引发出的一连串的反应。但是《笑府》“看镜”一则更多地反映了当时不同阶层、职业人物的心理。而《译准笑话》第109则则是单纯地停留在误会这一层面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在日本，关于镜子的传说，从《百喻经》第35话“寶篋の鏡の喩”的佛教故事开始，就广为人知。江户时代，通过谣曲“松山鏡”和狂言“土産の鏡”等作品，镜子传说也逐渐固定了下来。

还有《译准笑话》第125则。少女将嫁，有询于嫂。嫂曰，不可胜言。既而回鸾，怨曰，妄语娘。及重归宁，问，夫妇之道，何神所创。曰，诺册二尊，为何问之。曰，欲上物报赛也。这与《笑府》卷九闺风部“问嫂”（笑A收入，不见于笑B）一则极为相似。

旧话云，有出嫁者，哭问嫂此礼何人所制。嫂曰，周公。女将周公大骂。及满月归宁，问嫂周公何在。嫂云，寻他做甚。女曰，欲制一鞋谢之耳。本话应该是按照“问嫂”改写而来，其前半部分与“问嫂”的第一部分相近，后半部分则因为日本并没有周公制礼的说法，所以代之以日本的两位神祇。

(3)故事的合理化

比如《译准笑话》第129则：塾师好昼寝，而禁人太严。曰，我乃梦见周公也。生徒有犯者，大怒，骂为粪墙朽木。生曰，吾亦梦见周公。师诘曰，实梦周公，所说何事。答曰，小生以先生弟子请见，周公曰，吾未尝有与汝先生梦见也。与之类似的是《笑府》卷二腐流部的“昼寝”（笑A收入，不见于笑B，另亦见于《笑林广记钞》）一则：

一师昼寝，及醒，谬言曰，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效之。师以界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语。荅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会尊师。

“又（昼寝）”：夫子贵宰予以朽木粪土。宰予不服曰，吾自要见周公，如何怪我。夫子曰，日间岂是梦周公时候。宰子曰，周公也不是夜间肯来的人。日本的这篇笑话大体上与《笑府》昼寝的第一小段相同，而“粪墙朽木”一语显然是参考了第二小段“又（昼寝）”，并且更

加接近《论语》中的原文。不过日本的笑话中明确地将塾师定义为一个“禁人太严（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人物，这与《笑府》中老师偶然入睡的设置还是有所区别的。小咄中亦有类似笑话，如《笑顔はじめ》中的《先生》一则，汉译为：

老师睡午觉，却不让学生睡。学生于是说：“光你一个人午睡，这是为什么？”老师说：“我是为了去梦里见周公。”第二天，学生也午睡了，老师非常生气，用戒尺把学生打醒：“真是个可恶的家伙！我不是说了好几次不许你午睡吗？为什么？”学生说：“我也是为了去见周公。”老师说：“你真是个嘴硬的家伙，那我问你，你说你真碰见了周公，那他跟你说了什么？”学生说：“周公说在梦里一次也没有遇到过老师您。”因为是直接翻译自《笑府》，因此和原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又如《译准笑话》第148则：有比邻并惧内者，甲往诉乙曰，狮吼叵耐，奉盥荐寝，皆使我执役，不亦甚乎。乙慨然激昂，攘臂扼腕曰，唉，汝虽怯懦，何乃至此乎。若俾我为汝，言未毕，其妻隔障喝嗽，乙乃敛容曰，固亦谨奉役耳。出自《笑府》卷八刺俗部“掇马桶”（笑A收入，不见于笑B）。

甲乙俱惧内。乙往诉甲曰，房下近来作事更狠，至晚马桶亦要我掇。甲攘臂言曰，这个忒难，若是我。言未毕，甲妻背后大喝曰，若是你，便怎么。甲不觉下跪曰，若是我就掇了。

中国和日本在居住形式上的区别使得这则笑话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明代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马桶的使用是很普遍的，为妻子收拾马桶则成为了丈夫的奇耻大辱。但与此相对，日本则是席地而居，丈夫的执役也变成了侍奉妻子梳洗，晚上铺设被褥。

此外，与《笑府》中动辄大喝的悍妇形象有所不同，《译准》中的妒妇相比较之下显得更为文静，但只是一声咳嗽就吓得丈夫敛容正坐，其威势当还在前者之上。由此亦可见作者在描画人物形象时注意到前后一贯，并有意识地进行合理调整。还有，中国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妻子罚丈夫下跪的场景在日本作品中不太常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相较于中国，在性别观念上还是较为保守的。

注重情节一贯性的笑话还有《译准笑话》第115则：

人倚舷垂手，俄有来船，相轧而过，指梢都糜碎，独大拇指存耳。还家说过，妇忧而诫之曰，郎性慕苴，吾尝所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慎毋就舷而漩焉。与此相似的笑话亦见于明和五

年和刻本《笑府》：

一人遇两来船，手托在窗槛外，夹伤一指。归诉其妻，妻骇然属曰，今后遇两来船，切记不可解小便。[虽未见于《笑府》原本，但出版于明和五年(1768)的和刻本《笑府》中收入此话。另，宽政六年(1794)出版的《笑林广记》选译本《解颜新话》（未足斋月风译）及文政十二年(1829)出版的和刻本《译解笑林广记二卷》（清游戏主人原辑，日本一嘘道人译解，江户玉岩堂和泉屋金右卫门刊本，2册）中亦收入此笑话，但《译准笑话》出版于文政七年（1824），故从时代前后来考虑，第115则应是参考明和五年版《笑府》所作。]

比较来看，第115则中丈夫不是“夹伤一指”，而是四指尽失，“独大拇指存耳”。因为若将手搭放在船舷上，则必然四指垂放在外，大拇指在内；若从真实情况来讲，两船交汇时，失去四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译准笑话》的作者在创作第115则笑话时，应该仔细考虑过笑话中所描述的场景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然后在创作中做出适当的调整。

还有，妻子告诫丈夫时，与《笑府》中简洁的嘱咐不同，第115则中妻子还解释了为何要丈夫注意的原因，即丈夫性格“慕苴”（原书中此词左边附有意注“やりはなし”，形容某人做事莽撞，不考虑后果），故事的情节展开则更加合理。

周作人曾经说过：“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接透彻。”（《明清笑话集》，周作人校订，中华书局，2009年）日本笑话集在从中国借来笑话题材时，以日本的风俗取代笑话中的中国风俗，从而消除了理解的障碍，使得与中国人具备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日本读者能够更易于读懂笑话。

(4)中日笑话的“和而不同”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某些笑话具有相似的趣旨，因而很容易被视为二者之间具有影响关系的证据。但在实际上，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存在着某种影响关系。比如《译准笑话》第73则和《笑府》卷一古艳部的“借牛”（笑A笑B皆收入）一则都是有关文盲的笑话。

《译准笑话》第73则：村家儿学书，父见净书，有所指摘。儿曰，师爷法帖如是。父把而见之，儿哂曰，阿爷倒看。父曰，不啻溜，令汝视也。

《笑府》卷一古艳部“借牛”：有走束借牛于富翁者。富翁方对客，讳不识字，伪仿臧视

之。对来使曰，知道了，少俾我自来也。虽不识字，却已暗合。

余所识一富翁，向人索债，倒持契书。其人笑之。翁怒曰，吾持与汝看，岂自看耶。又方对客，适邻家致束。翁展视，客知其贸贸。故问之，翁曰，请我吃酒耳。使者曰，非也，乃告借铜锣铜鼓一用。翁笑曰，借铜锣铜鼓，难道不请我吃酒。人更服其机敏。

因为两则笑话中“倒看”和“倒持”这种写法极为相似，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译准笑话》是受到《笑府》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实际上，这两则笑话之间很难说必然存在着影响关系。因为类似的笑话，亦见于成书于日本镰仓时代的佛教说话集《沙石集》（1283）中。而宽政十年（1798）出版的汉文笑话集《善谑随译续编》就受其影响，其书中有这样一则笑话：

有大施主请众僧，而读诵般若。一老僧倒执卷矣。施主见而异之曰，奇哉，彼僧所执之经倒也。其比座僧惊，更倒所正执之经。老僧乃顾意气扬扬，以自为得矣。

此外，小咄本《闻上手》中亦有类似的笑话（こよみ）：

“今天真是好天气，稍微灸一下吧。”“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好日子啊。那，阿松，去隔壁把历书借过来。”仆人答应，把历书借来了。噢，给我看看。主人打开（历书）看了起来。仆人说：“老爷，这历书是倒的。”“什么？倒的？奇怪了，邻居就是倒着给你的吧？”

由以上例子可见，相同笑点并不能说明笑话之间具有影响的关系。在研究那些可以超越语言障碍，如中国与日本，甚至是世界通行的笑话时，很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江户时期的笑话集《译准笑话》与明代《笑府》中相对应作品的比较分析，考察《译准笑话》的作者，即江户时期的儒者编写笑话集过程中，在“用语的文言化”、“内容的本土化”、“故事的合理化”等方面做出的实践。对待当时文坛的浮靡倾向，作者持批判态度，这也是作者写作《译准笑话》的一个原因。在书最后所附跋文中，作者指出，“如《开口新语》《笑堂福聚》，并好效左氏辞令，自矜文藻，务逞伎俩。故多失乎浮靡。”比如《译准笑话》第29则与《笑堂福聚》第17则为同一题材的笑话，其原文各如下所示。《译准笑话》

第29则：荡子数游北里，夜乡晨乃还。父悲不寐以俟，自启户诘责。子惶遽失措，曰自吉原回。父骂曰，亦说谎乎。《笑堂福聚》第18则：一少年为人老实能干，尝以小事给其父。虽已悔改，父意犹不解焉。自此之后，不论实与否，每事骂云，亦给乃翁乎。一日少年从外而还，父云，何所之。少年故谓云，夜来饮妓馆，今日观戏剧，归路过囊家，输失十余缗矣。父大骂云，儿也无赖，亦复给乃翁乎。（《汉文体笑话ほん六種》武藤禎夫编，近世风俗研究会出版，1972年）与《笑堂福聚》近百字的长文相比，《译准笑话》仅仅只用了39字就表现出了不逊于《笑堂福聚》的幽默效果，从中亦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及高超的写作技巧。

《译准笑话》全书198则笑话中，内容从政治讽刺到猥谈艳笑，无所不包。各个笑话基本都可以找到出处。该笑话集的创作来源比较丰富，如中国的笑话集《笑府》《笑林广记》。就《笑府》而言，因作者身在日本，所以恐怕不容易看到明刻本《笑府》，作为其参考的应该是前面提到的两种和刻本《笑府》。另外，因为在《译准笑话》中也能看到参考《笑林广记》“赤壁赋”改编而成的笑话，所以作者也应该看过《笑林广记钞》。除上述中国笑话集以外，《译准笑话》中还有很多作品取材于日本小咄本及《译准开口新语》（1751）《笑堂福聚》（1804）等汉文笑话集。相对而言，作者自己创作的笑话比较少，这大概是因为作者创作本书的最主要的着眼点还在“译准”二字上。

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文政年间，一直以来局限于江户和京都地区的学问向地方扩散，亦可视为地方文化开始繁荣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学习学问即汉文的人也不断增加，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汉文写作的需要。对此，当时的儒者也在努力寻找汉文学习的有效方法。在此语境之下，本文所考察的江户时代日本儒者所作汉文笑话，就成为儒者所推荐的可资模仿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笑话在中国本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往往语言轻浮，内容低俗而为士大夫及文人学者所鄙夷。但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文笑话则经过儒者的重重改造包装，如前文所指出的“用语的文言化”、“内容的本土化”、“故事的合理化”等等，以其简短易学而又风趣幽默的特点，成为汉文学习者学习汉文的一种重要范本。

（作者单位：日本富山大学）